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

大地的女儿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

大 地 的 女 儿

陶 春 杰 校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画、插图：张守义

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Coward-McCann, New York, 1935.

根据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出版社 1935 年版校译

大 地 的 女 儿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

陶春杰校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48,000 字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书号 11002·582 定价 0.77 元

序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890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她的父母原是贫苦农民，一年四季辛勤耕作，仍养活不了六口之家。她父亲自以为身强力壮，只要拚命苦干，有朝一日总可出人头地，发财致富。于是，他离开了农村，拖家带口，先后来到科罗拉多州南部和新墨西哥州北部，在洛克菲勒财团所拥有的煤矿上出卖劳力。当然，他所找到的只不过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结果，不仅艾格妮丝的母亲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未老先衰，而且她的姨妈也被迫卖淫来接济全家的生活。贫困和苦难早就在艾格妮丝的心灵里播下了叛逆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

艾格妮丝才十六岁，她的母亲就因劳累过度而悲惨死去。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她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学习，她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进入了一所师范学校，并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以后又到加利福尼

亚州一所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打字教员，因参加“言论自由运动”而被校方解聘。

1916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从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在那里呆了四年，在以打字员工作谋生的同时，夜晚上大学学习。她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一面为社会主义日报《号召》及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由于这些进步政治活动，她于1918年被捕入狱，关押半年后才交保释放。出狱后，发表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铁窗难友》，这是以在狱中和她共患难的妇女的命运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同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而在行前曾要求探望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获一见；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丧生。艾格妮丝满腔悲痛与愤怒，于次年离开了她出生的国土前往欧洲，寻求出路，探索真理。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柏林居住了几年，以教授英语为生，同时继续参与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紧张的生活给她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她一度濒于精神崩溃。1927年她在丹麦和捷克疗养期间，开始写作《大地的女儿》。回到柏林以后，经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介绍，她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前来中国工作。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928年经苏联到达我国东北，立即开始调查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集结情况，

写成了精确的报道。可是《法兰克福日报》社将信将疑，把她的稿件一直扣压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予发表。她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接近进步人士，并根据她的采访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民的命运》，于1933年出版。同年，因健康情况恶化，她前往苏联治疗，并完成《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史沫特莱旗帜鲜明，在她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著作中，热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并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除聘约。

史沫特莱从苏联返回美国，希望找到一家美国报刊聘任她为驻华记者，这一希望成为泡影。1935年，她来到上海，投身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的工作。1936年她在陕西临潼从事写作，正好遇上西安事变，于是从西安用英语将事变的真实情况播送到全世界。次年一月，她前往延安，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她一面协助抗日军政大学建立鲁迅图书馆，一面准备撰写朱德同志的传记《伟大的道路》。1937年8月，她忍受着背部的伤痛，担任八路军的随军记者。她的战地通讯集《中国在反击》于1938年出版。由于病情再度恶化，史沫特莱于1940年9月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进行医疗，次年夏返回美国，从而结束了她在中国十三年的战斗生活。

回到美国以后，史沫特莱在各地发表演讲和文章，又先后出版了《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两

书，宣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赢得了美国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遭到了反动派的嫉恨。1949年，麦克阿瑟司令部诬陷她为“苏联间谍”，史沫特莱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迫使对方收回谰言。但反共的叫嚣和对进步人士的政治迫害已经使她感到难以在自己的国家容身。这时，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她立即启程前往伦敦，办理前来新中国的签证。1950年5月，史沫特莱因溃疡症在伦敦住院，手术后不幸逝世。遵照她本人的遗愿，遗体运回她身前热爱的中国，安葬在北京郊外八宝山革命公墓。

《大地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初版于1929年，曾被译成俄、法、德、意、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作者早年的生活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但小说又远远超越了作者的个人经历，而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正如作者从一开始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描写大地——就是我们全人类由于某种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片大地。我描写贫贱的人们的快乐和悲哀，描写他们的孤独，描写他们的痛苦，也描写他们的爱情。”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自传，也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这是一颗热情、敏感的灵魂受难的记录，这是一个单纯、正直的少女对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不满、愤怒、控诉，这是一个不畏强暴的弱者的战斗历程，这是一

个旧秩序的叛逆在黑暗中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长征。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战场上阶级搏斗的“野史”。这里燃烧着爱与恨的烈火，燃烧着痛苦与愤怒，燃烧着憧憬与追求。

《大地的女儿》用血和泪的语言展示了史沫特莱的“根”，同时也预示了这棵饱经蹂躏而不屈不挠的幼苗成长的方向。读过《大地的女儿》，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本书中译本最初由上海湖风书局于1932年出版。解放后，又经陶春杰同志校译，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重新出版，又根据原书对译文作了一些改动。

巫 宁 坤

1981年2月于北京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约在一九四八年)



史沫特莱一家(一八九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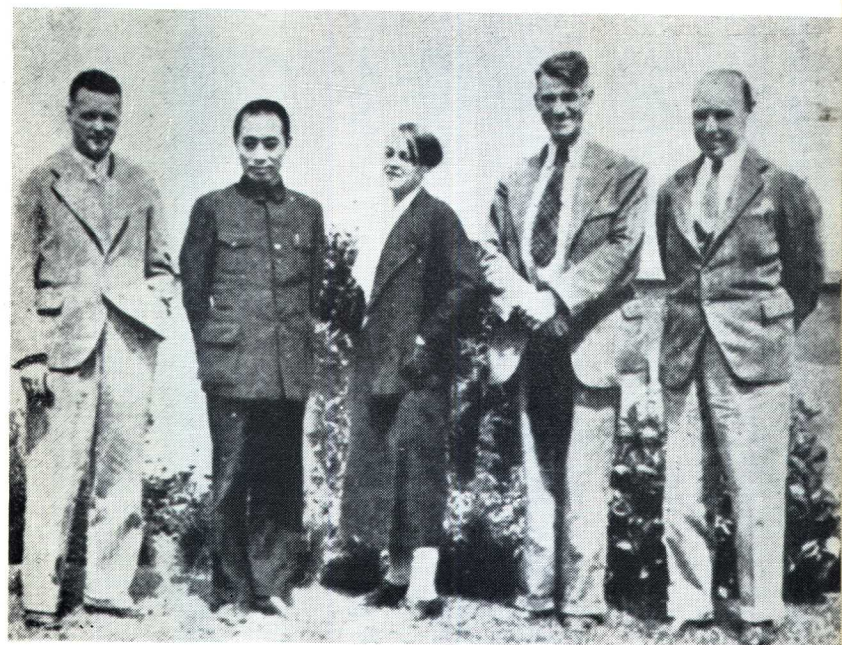
前排(左起):妹妹碧儿崔丽斯,父亲,

弟弟乔治和丹尼,母亲。

后排(左起):史沫特莱,姐姐安妮。



在亚利桑那州一所
师范学校读书时的
史沫特莱(约二十岁)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和史沫特莱等美国友人在武汉

(《图书馆学通讯》供稿)

Eine Frau allein

MEIN LEBENSROMAN



VON AGNES SMEDLEY

Presented to
Lu Hsiin

in admira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
for a new
society.

Agnes Smedley

Shanghai
February 2, 1930

史沫特莱题字赠送鲁迅的《大地的女儿》法文译本

(《图书馆学通讯》供稿)

1

我面前是一片汪洋的丹麦海。冷清清，灰沉沉，广阔无垠。看不到地平线。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成一片。一只飞鸟，张开两翼，在海上翱翔。

我在这里寄居几个月了，凝望着海——提笔写这一篇人生的故事。我写下的不是一件供人在闲暇时鉴赏的雅致的作品，也不是一首能够使人心旷神怡，忘却世间烦恼的乐曲。这不过是在绝望和痛苦中所写的一篇生活的故事罢了。

我描写大地——就是我们全人类由于某种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片大地。我描写贫贱的人们的快乐和悲哀，描写他们的孤独，描写他们的痛苦，也描写他们的爱情。

这些日子，我面前的天空，正和我的心情一样黯淡。看不到地平线——也正和我的生活一样。我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我尝遍了苦涩之泉。我曾经恋爱过，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痛苦算是离开了我，可是有时候爱情本身就是痛苦的。

我现在正站在一种生活的尽头，快要踏进另一种生活的门槛。我正在沉思，正在估量。我的四周

是过去生活的断壁颓垣。如今，认识和毅力代替了盲目的信仰；经验给了我知识，我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我有了工作，它的范围与意义都是无穷无尽的。这些还不足以抵得过爱情吗？

我注视着水面遐想。我曾经一度这样想：还不如到海底里去寻找我的前途哩。但是现在，我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记得母亲有一条百衲花被，是她拿鲜艳夺目的碎布缀成的。她还缝过一条一色的蓝被。那蓝被，我看一会儿就够了，那百衲花被，我却恋恋不舍地看了又看。对于我，这是一种奇遇。

我将把我这些生活的断片收集起来，缀成那样一条百衲花被，或者刻成一件花样有趣参差有致的镶嵌工艺品——这也会是一种奇遇吧。

死，也会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种为美而死的人。我属于为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类人——为贫困所折磨，为财富与权势所欺凌，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我们中间也有少数人的死是由于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或幻灭而感到绝望，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说来，“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因为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

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记忆，是一种异样的爱情与神秘的感觉。我那时还实在太小，所以只能回想起当时的一些感觉——此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记

得父亲在睡梦中紧紧抱着我贴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这究竟是记忆的开始呢……还是一种梦境？

那时候，我顶多不过一岁——因为这时比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姊姊安尼在阳光和煦的草地上一株枝叶扶疏的胡桃树下玩耍的幼儿时期，还要早得多。父亲在山顶上干草田里干活，我可以听见他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母亲手里提着两桶水，沿着幽长的小径，朝山上我家的小木屋走来。她赤着脚，风卷起那宽大的花布连衣裙，紧紧裹在她苗条的身体上。

你若是从井边再往前走两步，就会来到一条两旁长满了密密的矮树和高高的榆树的沟渠边。沟对岸的远处，一簇簇浓密的小树丛下，开着一片鲜花，又丰腴又娇嫩，经不起一线阳光的照射。它们一株株独自开放，花枝柔和地摆动着。这些都是花朵的娇柔玄妙的思维啊。在我童年的心灵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我和它们谈话，我也和草地上胡桃树梢的风谈话。

我们很穷。但是我并不知道。因为全世界好象都跟我家一样——至少密苏里州北部绵延二百英里内的这个世界都和我们一样。一片岗峦起伏、物产菲薄的石田瘠地一直伸出地平线外，接上了太阳落山处的天空。在我们看来，这世界的疆域一边是县城，另一边是密苏里河。北面边界上有一座数百居民的市镇。至于南面边界上——在我父亲的想象

中，密苏里河上有一座叫做圣约瑟的神秘城市。然而他是一个充满漂泊者的心情和幻想的人物。人们听他讲那些有声有色的冒险故事，并不一定相信。因为他跟他们不同；实在的，他几乎可说是一个外国人。在我们的世界里谁也不知道他的家世。他们这一家人不是农民，有人说他们不稳定，不可靠——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浪人；他们的血管里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而外国人或印第安人，你是永远不能信任他们的。

后来，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平线扩展到了堪萨斯城。这是由于我的一个年轻表兄弟的离家出走，震动了全村。三个月以后，他回来了——变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已经学会当理发匠了……还穿着公司里买的服装哩！

我坐在这里，模糊地想起了爱情……想起了火……想起了红颜色。是那只栖息在我们樱桃树上的红鸟吗？……是那件我小时候穿过的红外套吗？……哦！我想起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烧火——一堆可爱的火。我的炉子是石块砌成的，炉壁就是我家那两间木房的板墙。离我烧火的这面墙不远的地方，有两棵高大的雪松，中间挂着一个秋千架。火焰辉煌艳丽地燃烧着；假如不是给我母亲发现了，拿她的钢顶针敲我的头，这火必定会燃烧得更加艳丽。她常常用绷硬的钢顶针敲我，敲

得我恼怒不堪。我的艳丽的火，辉煌的火，她只要一发现，就要将它扑灭……同时也好象扑灭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火焰闪烁的时候，多么温暖，多么可亲啊！现在我懂得了火与爱的本能之间的精神联系。我母亲却不懂这些，她在学校里只上到六年级。我父亲也不懂——他只读完三年级，他说，这对于一个男子已经够了。只有花花公子和妇女才需要教育哩。

我记得母亲的钢顶针的敲击，也记得那打在上象小刀一样锋利的树枝。她为什么要时常鞭打我，我不知道，我怀疑她自己是不是也知道。她说我玩火，说我撒谎。我看不出这与她有什么相干。她那不愉快的结婚生活一年一年过去，儿女愈来愈多，她鞭打我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我原先不知道有时可以还击那些无缘无故打我的人；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只因为她身材比我高大，她才敢随意摆弄我。我于是急切地盼望长大起来。

她更想出了新的鞭打人的方法：她手里握着树枝站在那儿，命令我走上前去。我哀求，我哭喊，我想逃走，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走过去。她并不用手抓住我，却逼我自己挑选一个地方站定，任她没头没脑地鞭打。事后，我要是跟一般小孩一样呜咽不止，她就勒令我停住，不然，就要“把我踩到泥里去”。我记得有一回我没有马上停住，她就象老鹰一样扑到我身上乱打——头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